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留守家庭的 相对贫困问题

——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域

吴宗友 甘文园

摘要：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

关键词：社会资本；全留守家庭；乡村振兴；相对贫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2）01—0147—07

与传统意义上因核心成员外出而导致家庭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呈现“不完整”状态的留守家庭不同，本文的全留守家庭是指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的夫妻双方均长期生活于户籍所在地而使家庭呈现为留守在当地的“完整”状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对象不包括少数乡村能人（村干部、种养殖大户等）的全留守家庭。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家庭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得以摘帽，12.8万个贫困村集中脱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①随着这场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工程的顺利完成，在后脱贫时期党和国家需要巩固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在全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行动。农村全留守家庭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之一，必将成为新时代这场宏大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坚力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决定了乡村振兴的质量。因此，如何调动广大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积极性，助其从“催着干”转变为“争着干”，这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深入当下的乡村，如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关系贫困”等视角来分析乡村振兴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来审视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便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研究”（项目号：21ZDA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宗友，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大学数字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区治理、文化社会学研究。

甘文园，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区治理研究。

^① 樊成琼：《脱贫攻坚耀史册，乡村振兴开新局》，《贵州日报》2021年3月2日，第1版。

不难发现，在后脱贫时期广大农村仍然在客观上存在不容忽视的隐形贫困问题，亟待学界和政府对其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探究。

一、文献简要回顾与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展扶贫工作以来，贫困一词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笔者以“贫困”作为检索词在学术网站上进行检索整理，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贫困问题的讨论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相关减贫、反贫政策的实施困境与解决路径。叶兴庆首先从农民物质生活变化和贫困现象发生率角度深入回顾和反思中国反贫困政策，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在实践中不断对反贫困政策作出调整是必要的。^① 胡晗等人利用陕西省多个基层贫困户的调查资料对中国减贫和反贫困政策进行定量分析，认为产业扶贫政策在助力贫困家庭减贫、致富方面颇有成效，提出应在产业扶贫政策指引下扶持农民筑牢农业生产的根本。^② 二是大量学术文献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式收集数据，调查农村地区不同群体的贫困现状以及贫困对不同群体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有关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是经济收入低下、物质资源匮乏等福利被占有的状态，还是一种贫困群体对所处境地无能为力的脆弱性，贫困群体因遭受多重剥夺，在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缺乏力量，而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③ 克罗克（Crocker）等人认为，在低收入家庭中比较常见的是资产的获取无力，这对贫困群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成为农村女性群体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地位的制约性力量。^④ 三是关注个体贫困户的贫困经历以及应对措施。杜兴端等人利用统计学分析工具，从土地流转的扶贫成效角度研究个体贫困户的贫困问题，认为个体贫困户因其自身的缺陷具有很强的贫困脆弱性，通过土地流转可以促使贫困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成为职业农民，从而达到较好的扶贫效果。^⑤

综上不难发现，从农村全留守家庭角度开展的贫困问题研究还相对较少，而在重视人情和社会关系的中国社会，从社会资本视角探析农村留守家庭贫困问题更是鲜有专题论述。在后脱贫时期缓解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农村全留守家庭则是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重要内生力量，因此从社会资本视角探析农村全留守家庭的贫困类型和致贫原因，进而寻求可行的对策路径，就成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的必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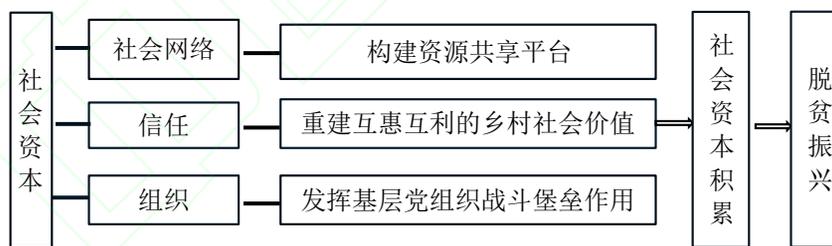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资本助力脱困分析框架

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构建。该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存在的资本形态，社会网络、信任、规范以及组织是其核心要素。在“贫困”研究领域内，与物质视角的“收入贫困”和人力视角的“人文贫困”“能力贫困”不同，社会资本视

① 叶兴庆：《中国的反贫困政策》，《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J1期。
 ② 胡晗、司亚飞、王立剑：《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
 ③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④ Crocker, T. and Padilla, Y.C., Living on the Edge: Access to Liquid Assets as a Determinant of Unmarried Urban Mothers' life Satisfaction,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Vol.97, No.2(January 2016), pp. 134-141.
 ⑤ 杜兴康、曹旭欣：《土地流转的防贫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比较》，《四川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角的贫困观认为,当贫困群体遭受社会边缘化而处在严重封闭和社会区隔的境地时,可以通过对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重建来助其摆脱贫困。根据社会资本核心构成要素来审视农村全留守家庭贫困问题时,可以从组织、规范、社会网络和信任等角度分析致贫原因,尤其是在实践层面提出如何有效脱贫的行动策略,挖掘和培育农村全留守家庭的内生动力,壮大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力量,最终实现巩固脱贫成果、全面振兴乡村的历史任务。文章分析框架如图1(见上页)所示。

二、社会资本视域下L村全留守及流动家庭基本情况

本文主要以安徽省北部F市F镇L村为例,聚焦夫妻双方长期生活在户籍所在地的全留守家庭,研究其隐性贫困问题。这个群体由于社会资本相对缺乏,没有熟人带动、自身能力薄弱以及留恋乡土生活等原因而长期生活在农村;社会流动的大潮没有对其生活与生产带来直接的结构影响,而生活世界的长期封闭性使其整个家庭在城乡生产要素的市场流动和社会资本的空间整合中逐渐被边缘化,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均落后于当地的流动家庭。他们的勤奋虽然令其没有“沉落”为贫困户,但是相较于流动家庭,却实实在在地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状态,并因此在乡土性的地方社会中丧失了一定的话语权。

2021年1—3月,笔者带着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在L村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观察、网络调查等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包括F镇和L村地理位置、行政辖区、人口及其流动状况、扶贫举措、经济文化等。F镇地处F市城区南部7公里,北依城南新区,东临市经开区、阜合产业园区,南与王家坝相接,F镇总面积69.08平方公里,总人口6.2万人,包括15个行政村。L村位于F镇东南部,系由原先的连三村、新庄村合并而成,紧邻F市经济开发区,滁新高速穿境而过。目前,该村辖18个自然庄、19个村民组,589户居民,总人口3588人,总耕地面积4975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展精准扶贫行动,L村村委会在上级政府指导下,在村域内针对贫困户开展脱贫攻坚工作,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以及社会兜底扶贫等举措,近5年来投入资金约600万元,65户贫困户实现全部摘帽,L村绝对贫困问题得以解决。

表1 L村全留守与流动家庭基本情况(2010—2020年)

指标	留守家庭	流动家庭
家庭数量(户)	237	352
变动数量(户)	增加45	减少45
平均年家庭收入(万元)	10	25

数据来源:L村村委会网站<http://www.lianxin.gov.cn>以及实地调查资料。

F市是安徽省外出务工及人口流动大市,据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F市户籍人口1077.28万人,常住人口820.03万人,每年约有250万左右的人口在流动之中。根据实地调查,L村流动家庭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牺牲子女教育、故土情怀、家庭团圆换取了经济收益,流动家庭年均总收入一般在25万元左右;他们利用在外获取的经济收益回乡

购车造房,使他们在村里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而L村留守下来的家庭往往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较之流动家庭存在一定的差距,因其未曾通过外出务工或经营小本生意赚取相对丰盈的家庭收入,而致其经济拮据,家庭年均总收入一般不超过10万元,仅能维持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的一般性开销。因为L村近年来在政府推动下开展土地流转以进行集约化耕种,导致全留守家庭的劳动力以及其他留守在土地上的村民大多成为无地可耕的“散工”而处于被动闲暇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在有限的生活区域内通过出售农产品、为他人建房、日间进城做保姆等方式获取必要的经济收入,因工作不稳定,常常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三、后脱贫时期L村全留守家庭面临的相对贫困问题

如果说脱贫攻坚主要是解决物质性的绝对贫困的话,那么后脱贫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则必须聚焦如何激活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力量;换言之,乡村振兴必须高度重视全留守家庭人力资本量与质的有效提升。惟有充分激发农村全留守家庭的内生动力,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因为人是一切事业

的基础。以L村为例,依据笔者的调查,从社会资本视角来审视,全留守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边缘化贫困、囚徒式贫困以及无为式贫困等不容忽视的相对贫困隐忧。

(一) 边缘化相对贫困: 缺乏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

费孝通把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模式称为“差序格局”,他认为:“我们的关系网络不是井井有条的柴,而是石子落入河中推出的波纹,每个个体都是所属群体社会交往的中心,被波及就发生联系。”^①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也就是以社会行动主体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就社会整体而言,社会关系网络是由无数私人关系网络有机整合而成;就个人来说,每个社会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都会与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团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从而构建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作为行动主体展开社会交往的重要社会空间,它不仅是个体社会需求得以满足的社会基础,更是个体潜在的重要社会资源,是个人一切经济活动能否取得预期成效的必要保障。根据笔者的调查,L村全留守家庭在其生产生活过程中,主要面临两种社会关系网络匮乏的挑战:一是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的不足。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是指政府和其他正式组织,它们主要为全留守家庭提供物质、政策等方面的资源,在L村这类社会关系网络即是村委会。但是在调查中发现,L村大多数全留守家庭认为自己 and 村委会并没有什么联系,“对于涉及全村公共利益的事务,村委会也不会通知我们普通老百姓参加;而我们有什么困难,村里也很难帮我们解决,久而久之我们和村委会也没必要过多接触”。一位全留守家庭主要成员对笔者言及,他们对于村干部的一些不当行为进行辩驳后,村干部往往会在以后使些小绊子,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制造麻烦。因此,L村全留守家庭和村委会之间一般难以形成并维系有效联系,他们很难从村委会获取有助于其生产和家庭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这导致全留守家庭在乡村社会缺乏有效的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正式支持。二是非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匮乏。非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是指来自个人的社会支持,在L村主要表现为亲友、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对于全留守家庭来说,他们的非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附近的亲戚和邻里,而且受传统所谓“门当户对”思想影响,即便有亲戚或邻里通过各种努力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也往往会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对等,慢慢疏远而淡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换言之,L村全留守家庭非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异质性低,其关系网络结构内的成员社会背景绝大多数是相似的,对彼此均不具有资源的稀缺性和有效性,非组织型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提供的重要资源十分有限。由此可见,L村全留守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总体上来说是严重匮乏的。

物质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性的交往关系相辅相成,共同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L村全留守家庭相对于流动家庭而言,其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经济收入都明显处于弱势,即相对贫困状态,尤其是“社会关系贫困”更容易使贫困主体在当下的乡村失去许多发展机会,并进而在乡村社会中丧失一定的话语权,逐渐从乡村社会的“中心”退居至“边缘”。L村全留守家庭因发展资金不足、信息闭塞、思维固化等原因,往往主动或者被动划分到乡村社会的弱势阶层,认为自身和优势阶层不是一个圈子,没有共同语言,甚至因之在办理乡土事务时缺乏底气,遭遇优势阶层的社会区隔甚至社会排斥,而习惯于保持沉默,导致在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上常常缺位。最终,L村全留守家庭因缺乏嵌入地方性社会结构中的必要资源而在社会权力、政治参与、公共话语、经济活动等方面被全面边缘化,陷入隔离、封闭的发展困境,成为乡村社会被遗忘的群体,处于“边缘化相对贫困”状态。

(二) 囚徒式相对贫困: 丧失传统的乡土本色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本色主要表现为熟人社会,村民彼此从有意识之初到终老都相互生活在同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或群体频密的互动会产生一种“强联系”,并衍生出一种“厚信任”,这种厚信任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具有浓厚的中国式乡土本色。然而,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人口流动的加剧,尤其是网络社会的飞速发展,L村的社会结构、人际交往、价值观念、乡风民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皆发生了显著变化,现代性快速侵入乡村传统社会的肌体,导致宗族观念淡薄,家族、邻里、亲友之间传统式的信任因子逐渐消解,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再基于血缘伦理和熟人社会那种天然的可靠性,而是以现实的功利为第一导向。

在田野调查中村民Z(男,50岁)向笔者说道:

我们家族是由早前的6位祖先发展来的,我小的时候,家族里谁家有什么事情,无论男女老少都一窝蜂涌上去帮忙,大家处得像是一家人,孩子都能共养。现在不行了,一家有什么事情其他家里都没人愿意出面,怕惹到自己头上。就拿我家来说吧,我有什么事情也不愿意麻烦他们了,他们帮不了什么忙,我还平白惹人笑话。

Z的话语表明传统的社会信任和互助业已崩解,但是适应社会之需的新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梅里尔·弗勒德等人于1950年提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理论,借以隐喻当互相合作能使双方均获益时,却往往因为个人心理、相互竞争和外部结构等因素难以达成彼此信任,而放弃合作,终致双方利益皆受损。^①

L村全留守家庭因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面临现代性的冲击时,未能做出适当调整,导致丢失自身乡土本色的同时,生产生活呈现出囚徒一般的相互猜忌,难以维系社会信任,促使乡村社会更加碎片化,家庭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脱离乡村社会共同体,合作不再,内斗不息;加之信息闭塞,资源短缺,社会支持力量日益内卷化等,阻碍了全留守家庭走向更加积极的小康生活,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式贫困”。

(三) 无为式相对贫困:忽视相对贫困群体的潜在困境

2020年是中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就之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困,贫困家庭全部“摘帽”。L村也成功退出贫困村行列,65户贫困户基本实现脱贫任务,基层党组织、驻村工作队、扶贫第一书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L村底层贫困问题。但是,在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基层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市场力量)的工作重心基本转移到国家划定的贫困户这一特殊群体身上,相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主要资源也着重向贫困户倾斜,客观上忽略了作为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全留守家庭的发展问题,在乡村建设、福利保障、社会参与等方面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

诚如来自全留守家庭的村民W(女,45岁)向笔者所言:

你看我们村有的贫困户以前家庭条件还没我们家好,现在靠着政府帮扶,在村里扶贫车间干个小活,生活过得也挺滋润,再加上政府危房改造补贴,现在房子建得又大又漂亮,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文化,不能去外地打工,长期在家里待着也挣不了几个钱,今年全国都要脱贫了,我家现在这条件也就吃喝没问题,国家什么时候能想到我们,给我们提供点工作,也让我们改善改善生活,多挣点钱,像村里有钱人那样建个大房子,那该多好啊!

W的朴实话语代表了村里事实上处于贫困线边缘的相对贫困群体的普遍心声,这是后脱贫时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群体,他们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乡村振兴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将老子“自然无为”思想大而化之,甚至是曲解了这一思想,将所谓的自然之道延及社会层面,把老子哲学核心概念的“无为”俗化为日常生活语言,用来指称不作为、不做事、安于现状,甚至无视危机的一种心态及其相应的社会行动,不去努力寻求积极的改变,不进行外界干预,消极地持守所谓的顺其自然之状态。^②根据笔者调查,L村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时,对相对贫困群体过度忽视,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激发以全留守家庭为代表的乡村建设主体,导致他们在乡村发展中缺乏存在感与参与感,处于因乡村建设决策者和主导者的“无为”而造成的相对贫困状态,即“无为式贫困”。

^① LiJiawei,Hingston P,Kendall G. Engineering Design of Strategies for Winning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competi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 Ai in Games*, Vol.4, No.3(January 2011), pp.348-360.

^② 陈晓翔:《老子无为而治的当代启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四、社会资本视域下农村全留守家庭脱困策略

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是一项事关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系统性工程。激发全留守家庭内生动力不仅要从社会关系网络入手增强其社会资本,重构乡土信任以营造互惠互利氛围,还应在组织层面,通过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以及村委会的引领作用。基于此,结合L村实地调研,笔者认为应从以下3个层面着力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潜在贫困问题。

(一) 社会网络维度: 构建资源共享平台

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被认为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集合,有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之分(或者说正式和非正式之别),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项必备要素,它是由共同熟识和共同体认同交织而成的一种社会资源。^①就L村而言,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资源共享平台,促进L村全留守家庭在社会资源支持下有效获取经济收益并提升社会地位,从而激发其乡村社会建设的参与度,取得应有的话语权,重新回归到乡土生活的中心,是后脱贫时期乡村振兴必须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振兴乡村的首要工作。一是依靠正式的组织型网络开拓社会资源。L村因紧邻F市经开区和阜合产业园区,可以由当地政府牵头与园区企业对接,为L村青壮年劳动力就地寻求工作机会,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给予企业相应财政补贴,通过企业这种市场组织来保障村民的经济收益,实现企业与村民的双赢。近些年来国家鼓励乡村发展养殖业,当地政府应该引导并扶持全留守家庭开展规模化的养猪、养鸡、养鹅等家庭经营,让政策红利如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贷款等惠及相对贫困家庭。二是利用网络空间资源重构并扩展全留守家庭的社会资本。以数字化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衍生出了不同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表象空间的网络空间。^②基层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可以组织L村全留守家庭,集中开展网络技术培训,组建L村全留守家庭微信工作群,帮助他们学习微信、抖音等网络传播技术,借以获取各类信息,链接资源,扩展社会关系,如村民可以主动关注微信群和抖音视频内的招工信息。另外,随着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L村全留守家庭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出售当地品质较好的农产品如桃子、葡萄、无添加菜籽油等,发展电子商务。

(二) 乡土信任维度: 重建互惠互利的乡村社会价值

韦伯曾把中国人的信任归类为一种特殊信任,认为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信任。^③中国人的传统信任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在曾经的乡村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当前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贫困问题,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需要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重建适应现代社会的互信、互惠、认同、合作的社会价值体系。一方面,充分发挥乡村社会里新乡贤的积极作用,鼓励、支持他们开展信任教育。在L村,血缘纽带的社会整合功能并未完全丧失,乡土社会所具有区别于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时势权力的长老权力传统并未彻底断裂,可以利用乡土文化的这一特殊优势,敦请具有一定话语权和威望的新乡贤开展社会信任的教育行动,通过讲述老一辈人是如何携手合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胜利、如何在艰苦环境下亲如一家地不懈奋斗而为今天的生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从而唤醒村民的信任因子,引导以全留守家庭为代表的村民向老一辈学习,打破信任壁垒,突破囚徒困境,在合作双赢、互惠互利的氛围下开展乡村振兴行动。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公共活动破除矛盾纠纷。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乡土信任之丧失非一日所致,也非一事之过,是亲友、邻里之间长期的小摩擦、小矛盾没有被及时调和,日积月累导致彼此心生怨怼。因此,可以在基层政府、有关社会力量(如社区社会组织)或者村民都信得过的“中间人”的倡导下,以村民为主体举办一系列集体活动包括协商会议,将问题说出来,共同商讨解决,逐步增进互信,强化认同,整合力量,营造新型互助合作关系,构建乡

① 李朝柱、石道金、文洪星:《关系网络对土地流转行为及租金的影响——基于强、弱关系网络视角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7期。

② 刘少杰:《网络社会的结构变迁与演化趋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9页。

③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1—266页。

村振兴所必须的现代社会基础。

（三）党建引领维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决定了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国家为主导，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形成系统性合力，才能确保6亿农民为主体的“三农”现代化得以实现。无论是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还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伟业，都必须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前提和基础。L村脱贫攻坚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这点。驻村扶贫干部尤其是党支部第一书记，往往都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有的党支部书记本身就兼任股份公司董事长，他们可以在服务“三农”的党建工作中，借助其特殊身份，帮助乡村尤其是全留守家庭重组社会网络资源，同时引入当地所需要的产业及物质资本，为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注入活力，激活乡村振兴的各类要素、主体和市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体现在通过政治建设凝心聚力，并在调配和统筹资源进而带领乡村走向振兴的过程中占据各项事业的灵魂和主心骨的地位，通过制度建设和完善，确保发展正义得到充分彰显；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党组织核心作用的发挥就会成为“水中月”，乡村振兴事业就得不到人民的真正拥护和积极参与。在L村已经取得的脱贫攻坚成就中，党建成为集中民意和民智、凝聚民心 and 民力的纽带，成为政府和人民心连心的桥梁，促使L村的各项决策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形成社会协同和多元参与机制。L村基层党组织在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党群工作、入户服务、解危纾困等宝贵经验，尤其是驻村工作队和扶贫第一书记，常年扎根基层，与民同行，让党的领导深入乡村人心，他们是新阶段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特殊财富。因此，L村在新阶段解决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需要进一步弘扬党建引领的新时代红色传统，确保乡村振兴事业行稳致远。

总而言之，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蓄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解决相对贫困家庭的潜在贫困问题是振兴乡村的重要环节。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于底层贫困户和上层流动家庭来说是典型的相对贫困群体，这一群体的相对贫困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集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因素为一体的复合现象。从社会资本视角来审视，农村全留守家庭存在边缘化、囚徒化、无为化等相对贫困隐忧，需要学界对此高度重视，深入研究以全留守家庭为代表的乡村社会网络、信任、组织、规范等乡村振兴的相关因素，探究如何有效激发农村全留守家庭内生动力，在党建引领下系统性施策，多渠道并举，在根本上消除贫困的发生机制，卓有成效地解决乡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

[责任编辑：廖霞]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Higher-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ZHANG Xue-liang &HONG Xu-dong (122)

Construct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is a major strategy planned, deployed and promo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YREB”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by relying on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and towns along the river, a new urbanization pattern with regional linkage, reasonable structure,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formation will be formed with the Yangtze River as the regional link and agglomeration axis. However, constr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sweeping the snow before its own door” , cities in YREB are currently showing the phase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ighting independently” and “competition outweighs cooperation” . There is huge growth room for the network connectivity between node cities and the potential growth space formed by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tapp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construction of YREB,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reg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higher-quality development of YREB: 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the dual-center collaboration and leadership between Chengdu and Chongq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 the second is to move from the “two-c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engdu and Chongqing to the Chengdu-Chongqing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circle. “Double-circle cooperation” promotes the coordination of major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third is to actively plan the links between Chengdu and Shanghai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urban cooperation.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Left-behind Famili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WU Zong-you & GAN Wen-yuan (147)

China is currently at the historical turning of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eradication period. Left-behind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are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lving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left-behind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taking L Village of F Town in northern Anhui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finds that as for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ies, the lack of social network led to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arginal poverty, the fracture of traditional local trust led to the gradually prominent prisoner poverty and the neglect of relatively poor groups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led to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inaction poverty. Therefore, to solve the relative poverty problem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ies, we should not only help them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 but also promote the modern return of traditional local trust, transform and enrich rural social capital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in Post-epidemic EraSHEN Yue (169)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information sensitivity,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crisis, the rising number of stigma and rumors,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s a branch of global governance, media governance aims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and build a new media landscape by means of cross-cultural consultation,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refres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ions and the world or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of BRI consists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regulatory governance,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health governance. Under the current trend of “Sino-Globalization” , we should rationally analyse its roots and backgrounds to avoid the discourse traps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unpreceden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